

文章编号:1005-9679(2017)03-0100-06

# 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相关性 ——基于我国本土数据的实验研究

钱 坤, 秦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 现有文献描述性地探讨了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相关性; 总体而言, 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呈弱负相关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模型进一步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决策机制; 并通过实验验证了两者的弱负相关性; 有相当一部分决策者前后行为选择不一致。我们利用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本文指出, 道德许可效应给组织带来的危害胜于道德净化效应给组织带来的益处。本文支持管理者必须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进行引导, 不可放任员工自行调整道德行为。

**关键词:** 组织公民行为; 反生产行为; 道德自我调节

**中图分类号:** F 016; F 270      **文献标志码:** A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Data

QIAN Kun, QIN Xiangdo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mp;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Many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Meta-analysis have shown that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are only moderately negatively related. We first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how individual makes tradeoff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We then use lab experiment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ose two behavior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upport the finding of the Meta analysis. Some subjects were found changing their moral choices eve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use moral licensing and moral cleansing to explain our main findings. We further point out that the damage moral licensing brings to an organization may be greater than the benefit moral cleansing brings in. We recommend that the manager should intervene in the voluntary behaviors in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moral self-regulation

收稿日期: 2017-02-28

作者简介: 钱 坤(1992-), 硕士生,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Email: fredqian@sjtu.edu.cn。秦向东, 教授, 研究方向: 行为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

## 1 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有助于保持或改善支撑任务绩效的组织社会心理环境的行为。反生产行为是指有损于组织的运作或财产,或者降低员工效率的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虽然短期看起来对组织运作影响不大,但长时间积累会对组织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组织公民行为对于组织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提高生产效率、高效运用资源、协调群体活动、提高管理效率、改善企业文化、吸引优秀人才和维持组织稳定 (Podsakoff, 2000)。

反生产行为对于组织的消极影响更加易于量化:美国每年因为员工偷窃和欺诈行为造成约 400 亿美元的损失;33%~75%的员工实施过不同形式的反生产行为,而 30%的企业破产是因为这些行为造成的(张永军等,2010; Mikulay 等,2001)。组织公民行为依结构可分为二维、三维、四维、五维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最早做出分类的是 Smith 等(1983),他做出的二维分类包括一般顺从和利他行为。被广泛接纳的是 Organ 提出的五维结构,即利他行为、文明礼貌、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和公民美德。

反生产行为依结构亦可分为二维、三维、五维等,几乎在 Smith 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做出分类的同时, Hollinger 和 Clark 等(1983)对反生产行为的结构率先做出分类,他们将反生产行为分为二维:财产偏差、生产偏差。被广泛接纳的是 Bennett 和 Robinson(2000)的理论,他们把反生产行为分为组织偏差和人际偏差。

尽管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对于组织利益的影响截然相反,早期文献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有两个相同点:第一,两者均属自发行行为,即组织合同没有明确规定员工必须要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不能实施反生产行为,两者均受员工主观意识的支配,第二,两者均属角色外行为,超出工作职责要求(张永军等,2010)。从这样的概念定位来看,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显然受到员工个人道德的规范调节,组织公民行为在道德上是受到鼓励的,反生产行为在道德上要受到谴责。

无论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是否是严格自发的,两者都是员工个人心理调节过程。工作中积极的事件将触发组织公民行为,消极的事件将触发反生产行为。部分文献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对员工心理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这部分文献另辟蹊径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阴暗面和反生产行为的积极面。管理者持续推行组织公民行为将增加员工压力,影响员工身心健康。而反生产行为有助于员工发泄负面情绪,有利于身心健康。

## 2 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

因为做好事而使得自我价值感(self-worth)上升时,人们更偏好实施不道德行为。这一系列补偿行为被称为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Moinin 和 Miller(2001)发现一开始对性别歧视持否定态度的男性更容易在之后的决策中对女性进行歧视。Mazar 和 Zhong(2010)发现消费者选择有机和环境友好型商品后更容易说谎和偷窃。

因为做坏事而使得自我价值感受损时,人们更偏好做符合道德观念的行为来弥补受损的自我价值。这一系列补偿行为被称为道德净化效应(moral cleansing)。Carlsmith 和 Gross(1969)让被试电击“犯错误”的实验助手。他们在对比 4 组实验结果后发现,补偿和同情对于解释之后顺从的增加都不是必要的,暗示自我价值的受损对于之后的友善行为有支持作用。

Sachdeva 等<sup>[1]</sup>发现道德净化效应和道德许可效应有相同的触发机制。他们发现对于自我的道德选择的反思才会触发道德净化效应和道德许可效应,而对他人道德选择的认知不会触发上述 2 个效应。

个体的道德自我价值存在一个均衡。道德净化效应和道德许可效应是自我价值感认知的负反馈效应,两者使得偏离均衡的自我价值感向均衡方向移动:当符合道德的行为使得自我价值感上升时,触发道德许可效应,个体更偏向于实施不道德行为使得高于均衡的自我道德价值回到均衡;当不道德的行为使得自我价值感下降时,触发道德净化效应,个体更偏向于实施符合道德的行为使得低于均衡的自我道德价值回到均衡<sup>[1]</sup>(Zhong, 2009; Zhong, 2010)。

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因此被一并归类为道德平衡过程(moral balancing),和道德一致过程(moral consistency)相对,后者表示前后两个道德行为的选择一致。Mulder 等<sup>[2]</sup>认为自我系统的全部目标在于保持自我完整性,和道德与环境适应的充分性。

道德许可效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用于解释个体前后道德选择不一致。Klotz 等从道德许可效应的角度阐述了个体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最终导致继续实施反生产行为的原因。

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和两者所指向的道德自我价值均衡,为解释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适度正相关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许多试图解释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适度正相关的文献所使用的逻辑都可以归纳到道德自我价值均衡中来<sup>[3]</sup>。

### 3 模型设计

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性决定了实施者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使得他人或组织获益,而反生产行为恰好相反。为了使自己获益不惜牺牲他人或组织的利益,本文的理论模型把利益量化为金钱激励。

设第  $t$  期即时自我道德价值(moral self-worth)增量为

$$i_t = -(\bar{\pi}_{t,y} - \pi_{t,y})^\theta + \beta(\pi_{t,y} - \bar{\pi}_{t,y})^\theta$$

其中: $\pi_{t,y}$ 是他人的或组织的金钱收益; $\bar{\pi}_{t,y}$ 表示个体的道德选择可以使他人获得的最大收益;相应地, $\pi_{t,x}$ 表示无论个体如何进行道德选择,他人至少可以获得的最小收益。

本模型在 Gneezy 等<sup>[9]</sup>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增两个参数  $\theta$  和  $\beta$ 。其中  $\theta \in [0, +\infty)$ ,  $\theta$  越小,道德选择次数相对于每次选择涉及的收益额度对  $i_t$  的影响越大,当  $\theta=0$  时,收益额度对  $i_t$  没有影响。当  $\theta < 1$  时,道德选择次数相对于收益额度对  $i_t$  的影响较大;当  $\theta=1$  时,道德选择次数相对于收益额度对  $i_t$  的影响相当; $\theta > 1$ ,选择次数相对于收益额度对  $i_t$  的影响较小。

$\beta \in [0, +\infty)$ , 给定  $\pi_{t,y}, i_t$  随  $\beta$  递增。当  $\theta=1, \beta=0$  时,模型与 Gneezy 等<sup>[9]</sup>相同。

设第  $t$  期累计自我道德价值为  $a_t$ ,

$$a_0 = 0$$

$$a_t = \delta a_{t-1} + i_t$$

其中, $\delta \in (0, 1)$ ,  $t-1$  期 1 单位的累计自我道德价值积累到  $t$  期为  $\delta$  单位; $i_t$  在时间上累计进入  $a_t$ , 故称  $i_t$  为即时的自我道德价值,  $a_t$  为累计的自我道德价值。

由于  $\beta$  的存在,  $a_t$  可正可负, 与 Gneezy 等<sup>[9]</sup>不同。设第  $t$  期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u_t = u_t(m_t, i_t, a_{t-1})$$

其中,  $m_t$  是第  $t$  期金钱激励对效用的影响,

$$m_t = m_t(\pi_{t,x})$$

$\pi_{t,x}$  是自己的金钱收益。

$i_t$  是第  $t$  期即时自我道德价值增量,

$$i_t = i_t(\pi_{t,y})$$

在 Gneezy 等<sup>[9]</sup>的模型中,  $i_t$  不进入函数  $u_t$ , 当

期的在道德问题上的选择带来的负罪感对当期没有影响。而本文的模型中当期的道德问题上的选择同时通过金钱激励和自我道德价值的增减两个方面对当期效用产生影响, 一个人面临当期的金钱和由道德选择产生的即时自我道德价值增量两者的权衡取舍。

双方金钱收益满足

$$\pi_{t,x} + \lambda \pi_{t,y} = b$$

其中,  $\lambda \in (0, +\infty)$ ,  $\lambda$  是个体与他人或组织间的边际收益替代率: 牺牲个体 1 单位的收益, 可以给他人或组织带来  $1/\lambda$  单位的收益,  $b$  是常数。

在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个体在第  $t$  期完全不关心他人的金钱收益, 则他做道德选择时最大化自己的金钱收益而将他人的金钱收益降到最小, 此时他实施了反生产行为,  $i_t$  必定为负; 如果个体在第  $t$  期完全不关心自己的金钱收益, 则他做道德选择时把自己的金钱收益降到最低而使他人的金钱收益最大化, 此时他实施组织公民行为,  $i_t$  必定为正。

作如下假设:

$$(1)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 0$$

$$(2) \frac{\partial m_t}{\partial \pi_{t,x}} > 0, \quad \frac{\partial}{\partial a_{t-1}} \left( \frac{\partial m_t}{\partial \pi_{t,x}} \right) = 0$$

$$\frac{\partial u_t}{\partial m_t} > 0, \quad \frac{\partial}{\partial a_{t-1}} \left( \frac{\partial u_t}{\partial m_t} \right) = 0$$

$$(3) \frac{\partial}{\partial a_{t-1}} \left(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right) < 0, \quad \frac{\partial}{\partial a_{t-1}} \left( \frac{\partial}{\partial a_{t-1}} \left(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right) \right) > 0$$

$$(4) \lim_{a_{t-1} \rightarrow -\infty}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 0$$

假设(2)说明上一期累计自我道德价值对金钱激励没有影响; 假设(3)说明上一期累计自我道德价值越大, 当期即时自我道德价值增量对效用影响越小。

根据如上假设, 注意到

$$\lim_{a_{t-1} \rightarrow -\infty}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 +\infty, \text{ 给定 } u_t \text{ 的函数表达式, 必定}$$

存在  $\pi_x^*$  和  $\pi_x^*$  对应的

$$i^*(\pi_x^*), a^*(i^*)(i^* = (1 - \delta)a^*)$$

使得  $\frac{\partial u_t}{\partial i_t} \cdot \frac{\partial i_t}{\partial \pi_x} + \frac{\partial u_t}{\partial m_t} \cdot \frac{\partial m_t}{\partial \pi_x} = 0$ , 如图 1 所示。

当  $\pi_x < \pi_x^*$  时,  $a > a^*$  (累计自我道德价值大于均衡值), 再多增加一单位的金钱收益所产生的即时自我道德价值减少量的影响小于金钱激励的影响, 使得  $\pi_x$  增加, 累计自我道德价值  $a$  变小, 趋于均衡的累计自我道德价值  $a^*$ ; 反之, 当  $\pi_x > \pi_x^*$  时,  $a < a^*$  (累计自我道德价值小于均衡值), 再多增加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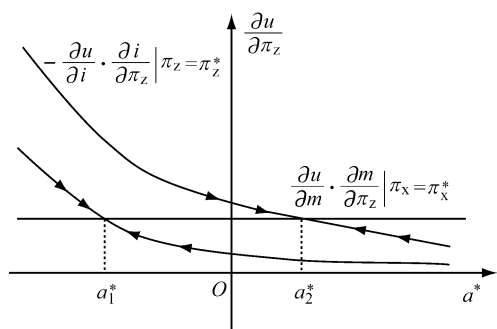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的累计、自我道德价值均衡

位的金钱收益所产生的即时自我道德价值减少量的影响大于金钱激励的影响,使得  $\pi_x$  变小,累计自我道德价值  $a$  增加,趋于均衡的累计自我道德价值  $a^*$ 。

故在给定假设下,  $\pi_x^*$ , 以及与  $\pi_x^*$  对应的  $i^*$ ,  $a^*$  是唯一的累计自我道德价值均衡。

当  $a^* > 0$  时,在均衡状态下,一个人每一期在自我道德价值中投入,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来使  $a = a^*$ ,自我道德价值处于盈余状态,当  $a^* < 0$  时,在均衡状态下,一个人每一期从自我道德价值中支出,实施反生产行为来使  $a = a^*$ ,自我道德价值处于赤字状态。

在个体的道德调节系统中存在既定的自我道德价值均衡,当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使得自我价值感上升时,触发道德许可效应,个体更偏好实施反生产行为,使得自我道德价值降低到均衡水平;当反生产行为使得自我价值感下降时,触发道德净化效应,个体更偏向于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使得自我道德价值上升到均衡。

## 4 实验设计

道德选择实验可以让被试自发地在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和实施反生产行为之间做出选择。

本文实验设计的目的在于检验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实验分为基准组和实验组。在基准组中,决策者需要做出一次选择,实施反生产行为可以使得决策者额外获得 4 元人民币,而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使得和决策者配对的一方额外获得 4 元;而在实验组中,决策者需要先后做出二次选择,每次选择实施反生产行为可以使得被试额外获得 2 元,而每次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使得和被试配对的一方额外获得 2 元。决策者第一次做选择时不知道还有第二次选择,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避免决策时其他策略性的考虑。

所有实验都在上海交通大学 Smith 实验室进

行,共举行 9 场实验,其中 4 场基准组实验,5 场实验组,每场 24 人,基准组 96 人,其中决策者 48 人,接收者 48 人,实验组 120 人,其中决策者 60 人,接收者 60 人。全部被试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实验收益使用人民币结算。被试不能重复参与 2 场实验。

## 5 实验结果

所有被试共 216 人,其中男性 142 人(65.7%),女性 74 人(34.3%)。其中,基准组 96 人,其中男性 66 人(68.8%),女性 30 人(31.3%);实验组 120 人,其中男性 76 人(63.3%),女性 44 人(36.7%)。有如下实验结果:

(1) 基准组中 68.6% 的男性和 76.9% 的女性决策者选择反生产行为 ( $Z = -0.560, p = 0.288$ )<sup>3</sup>;实验组中 78.4% 的男性和 78.3% 女性决策者第一次选择反生产行为 ( $Z = -0.011, p = 0.496$ );实验组中 73.0% 的男性和 65.2% 女性决策者第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 ( $Z = -0.632, p = 0.264$ );实验组中 62.2% 男性和 52.2% 女性决策者先后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 ( $Z = -0.757, p = 0.225$ );实验组中 10.8% 男性和 8.7% 女性决策者先后二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 ( $Z = -0.263, p = 0.396$ );实验组中 27.0% 男性和 39.1% 女性决策者改变前后二次道德选择 ( $Z = -0.972, p = 0.166$ )。

无论在基准组中还是在实验组中,性别对于被试在自发性道德选择中没有显著差异。

(2) 实验组中第一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的比例 78.33% (47/60) 和在基准组中选择反生产行为的比例 70.83% (34/48) 比较 ( $Z = -0.890, p = 0.187$ ) 没有显著差异。

在实验组中,在完成第一次道德选择前,因为被试不知道有第二次道德选择,故实验组中第一次道德选择和基准组中的道德选择具有可比性。实验组中第一次道德选择涉及的金额为 2 元,基准组中道德选择涉及的金额为 4 元,两个设计中道德选择没有检测到差异说明涉及金额对道德选择的影响有限。

(3) 在实验组中,第一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决策者中第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比例 53.85% (7/13) 显著少于第一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中第二次继续选择反生产行为的比例 74.47% (35/47)。 ( $Z = -1.424, p = 0.077$ )

<sup>3</sup>本文比例数据之间相互比较均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Z 统计量,显示渐进单侧显著性

测得第一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和第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85$  ( $p=0.078$ , 单侧显著性), 呈弱负相关性。本文实验结果与 Dalal (2005) 测得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测得的相关系数 $-0.16$ , Spector 等<sup>[4]</sup>测得的 $-0.13$  较为接近。

(4) 在基准组中, 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的比例 70.83% (34/48) 显著多于在实验组中, 先后 2 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的比例 58.33% (35/60) ( $Z=-0.890$ ,  $p=0.091$ )。

在基准组中, 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决策者的比例 29.17% (14/48) 显著多于在实验组中, 先后 2 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决策者的比例 10% (6/60) ( $Z=-0.890$ ,  $p=0.006$ )。

注意到结果(2)发现基准组和实验组间第一次道德选择没有显著差异, 在结果(3)观察到有 31.67% 在两次道德选择之间不一致: 有 20% 的决策者第一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 第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 有 11.67% 的决策者第一次选择反生产行为, 第二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这两部分人共同导致了从结果 2 到结果 4 的转变, 这表明在模型中拒绝参数  $\theta=1$ , 接受  $\theta<1$ , 即选择次数相对每次选择设计的收益额度更容易对个体的自我道德价值产生影响。

(5) 在实验组中, 第一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决策者中第二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比例 53.85% (7/13) 显著高于比第一次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中第二次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比例 25.53% (12/47)。 $(Z=-1.926, p=0.027)$

首先, 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决策者中, 改变道德选择的转而选择反生产行为的比例要显著高于首先选择反生产行为的决策者中, 转而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比例。这表明我们在模型中拒绝  $\beta=1$ , 接受  $\beta>1$ , 即选择道德行为相对于选择不道德行为而言更容易在道德价值上进行积累, 先选择道德行为的个体更容易触发道德平衡的过程。

## 6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结果(2)看到在没有惩罚或奖励的条件下, 反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要大于组织公民行为发生的可能, 所以, 在企业内部单靠员工自发的道德调节可能会对企业运转产生不利影响。这就需要管理者营造良好的企业组织内部的伦理气氛<sup>[6]</sup>。

结果(3)说明道德一致过程发生的可能大于道德平衡过程, 这使得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呈负相关性, 但道德平衡过程使得组织公民行为和反

生产行为之间仅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这表明提倡和宣传组织公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组织运转, 但是这种改善受到道德平衡过程的限制。

结果(4)和结果(2)的对比可以发现, 在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有相当一部分比例(31.67%) 的个体的道德选择发生了变化。

研究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文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注重研究诚信度测试, 从而给组织招募人员提供测试标准, 把偏向于实施反生产行为的应聘者堵在门外。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过度强调个体差异因素, 忽视了两种自愿行为的环境基础和个体共同因素。21 世纪以来, 研究逐渐深入到探究两种行为发生的条件。Fox 等(2001)提出反生产行为的情绪模型,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消极情绪和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研究得到广泛认可。

另一部分文献着重研究两者行为的前因变量, 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给组织控制两种行为的发生, 减少反生产行为, 增加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依据。然而, 在 Dalal(2005)利用大量数据得出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仅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之后, 研究者不禁提出反思: 如果在短时间内在同一个体中发现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 Dalal(2009), 对于具体某一个前因变量的控制是否能够推动组织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某个前因变量是否会在抑制反生产行为的同时抑制组织公民行为? 或者在鼓励组织公民行为的同时促成了反生产行为?

Spector 等<sup>[4]</sup>进一步发展情绪模型以应对前因变量的局限性。他们指出, 愤怒情绪会导致反生产行为的发生, 负罪情绪会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 而强迫性的组织公民行为会带来愤怒情绪, 反生产行为会导致负罪情绪, 从而使得两种行为在短时间内相互转化。

本文在实验中发现, 相当比例的被试在两者行为间相互转化, 与 Spector 等<sup>[4]</sup>的理论相互印证。我们进一步从道德调节模型去解释这种转化, 当组织公民行为使得个体的道德价值高于均衡时, 个体感到他们的付出没有被合理地奖励, 产生愤怒情绪<sup>[4]</sup>, 触发道德许可效应, 从而实施反生产行为; 当反生产行为使得个体的道德价值低于均衡时, 个体发现他们的消极举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产生负罪情绪<sup>[4]</sup>, 触发道德净化效应, 从而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个体在短时间内同时实施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使得个体的道德价值在其均衡附近波动。

由结果(5)可知, 道德许可效应作为自我道德调节的一环给组织带来了消极效应, 53.85% 的决策者

在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后,反过来实施反生产行为;而只有 25.53% 的决策者在选择实施反生产行为后,心生愧疚,触发道德净化效应,在第二次道德选择中选择实施组织公民行为。道德许可效应发生的可能超过了道德净化效应发生的可能,预示着如果管理者放任组织环境不管,员工自发的道德系统调节最终将使反生产行为主导企业文化,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 7 结 论

本文首先建立了理论模型,以探究个体如何在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间做出选择;随后通过实验检验了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相关关系,系统归纳并验证了部分文献关于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弱负相关关系并给出了解释。

基于本文的理论和实验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应该从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入手,去控制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短时间内企业员工就有可能会切换道德选择,这说明如果仅仅利用控制前因变量来达到促成组织公民行为,抑制反生产行为并不一定可行。

本文提供了中国本土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实验数据。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注定要擦出火花,而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是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中西方文化存异,中国文化以德为首,道德性对于这两类相对的行为应受到充分重视<sup>[7]</sup>。我国盛行“面子文化”“圈子文化”,个体道德系统的自我调节对两类行为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对两类行为的进行本土化研究,深入探讨两类行为的决策机制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非常有现实意义。

在组织内部,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或可扩大员工的道德许可效应,使得实施反生产行为

的员工能够回头,转而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缩小道德净化效应,使得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继续发挥其良好的品行,无怨无悔。继而,如何营造良好氛围以干预组织内部员工的道德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 参考文献:

- [1] Sachdeva S, Iliev R, Medin D L. Sinning saints and saintly sinners the paradox of moral self-regul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4): 523-528.
- [2] Mulder L B, Aquino K. The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aftermath of dishonest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3, 121(2): 219-230.
- [3] Spector P E, Fox S.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nd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re they opposite forms of active behavior? [J].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59(1): 21-39.
- [4] Spector P E, Fox S. Theorizing about the deviant citizen: An attrib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play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0, 20(2): 132-143.
- [5] 张小林, 戚振江. 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 *心理学动态*, 2001, 9(4): 352-360.
- [6] 刘文彬, 井润田. 组织文化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组织伦理气氛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0(9): 118-129.
- [7] 彭贺. 中国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分类的探索性研究[J]. *管理科学*, 2010(2): 86-93.
- [8] Erat S, Gneezy U. White li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4): 723-733.
- [9] Gneezy U, Imas A, Madarász K. Conscience accounting: emotion dynamics and social behavior[J]. *Management Science*, 2014, 60(11): 2645-2658.